

5-12

古文獻學研究若干領域的回顧與展望

Research in Classical Philology and Related Fields: Past Achievements and Future Prospects

陳東輝 (Chen Donghui) *

一、古文獻學的研究領域

目錄學、版本學和校勘學乃古文獻學之下屬學科，這是無可爭議的，除此之外還應包括辨偽學。¹ 古文獻學以古文獻為研究對象，辨別偽書應該是古文獻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具體包括考辨古書書名、著者以及年代真偽等。鄭良樹的《古籍辨偽學》是該領域首部通論性著作，該書的出版，標誌着辨偽學已經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繼鄭著之後，《辨偽學講義》成為中國大陸學者撰寫的第一部辨偽學專著。此外，《中國辨偽學史》集辨偽書學史與辨偽說學史於一體，表明了古文獻學研究者對辨偽學的關注。根據楊家駱的統計，中國歷代著述之確曾成書並經著錄者至少有 253,435 種，今存者僅約 10 萬種，² 由此可見古籍亡佚數量之多。輯佚學也應成為古文獻學的組成部分，並且已經逐漸受到學術界的重視。《輯佚學稿》雖然只有 7 萬多字，但作為第一部系統論述輯佚學的著作，功不可沒。《中國古籍輯佚學論稿》凡 37 萬字，是首部獨立刊行的輯佚學論著，內容豐富，研究深入，它的出版，使輯佚學真正擺脫了附庸地位，從而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至於編纂，洪湛侯《中國文獻學新編》將其列為古文獻學之組成部分，在第二編「方法編」中專列一章加以論述。他指出：「古典文獻之所以能夠彙集成書，能夠流傳至今，很重要的一個環節，便是『編

纂』。……古典文獻的重要體裁，如辭書、類書、詩文總集、叢書、政書、方志、圖譜、檔案史料等等，無一不是採用編纂方法，類輯資料，編訂而成。……歷代文獻學家積累了豐富的編纂經驗，正有待於我們繼承、總結和提高。」³ 又指出：「從理論上說，有書籍就有編纂，就有不同程度的編纂事業；再從書籍形態的構成來考察，編纂活動的產生，必定早於目錄、版本、校勘、辨偽和輯佚，因為如果沒有編纂家構想、設計，編成圖書，哪裡會有目錄？會有版本？校勘辨偽等整理工作，也就無從附麗，無從著手。因此，編纂在文獻整理方法中，應當是最先出現的第一道工序。從它的發展來看，中國的編纂事業，和光輝燦爛的中國文化一樣，源遠流長！」⁴ 恐怕沒有人會否認郭伯恭的《四庫全書纂修考》、《永樂大典考》和黃愛平的《〈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屬於古文獻學之著述，試想如果古文獻學不含編纂學，那麼這三部書歸入哪個三級學科呢？同時應該說明的是，中國古代編纂學與中國古代編輯出版學既有聯繫，又有區別。此外，有人主張古代典藏學應當歸入圖書館學的範疇。筆者認為，古文獻的保存、研究均離不開典藏，典藏學本身也是古文獻學的組成部分，再加上目前圖書館學專業教學、研究之內容涉及古代典藏學者越來越少，故古代典藏學還是作為古文獻學的下屬學科為宜。《校讎廣義》即包括《典藏編》，《文獻學綱要》的第 7 章之

* 作者係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1 辨偽學包括辨別偽書與辨別偽說兩個方面。古文獻學中的辨偽學，主要是指辨別偽書。

2 參見楊家駱，〈四庫全書綜覽·中國古今著作名數統計表〉，楊家駱，《四庫全書學典》（上海：世界書局，1946），頁3。

3 洪湛侯，《中國文獻學新編》（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頁10-11。

4 洪湛侯，《中國文獻學新編》，頁224。

標題為「文獻的典藏與傳播」。近年來，古代典藏學的研究成果頗為豐碩，影響較大者有《中國藏書通史》、《中國藏書樓》、《中國私家藏書史》、《浙江藏書史》等。世界著名藏書樓天一閣創辦的《天一閣文叢》和齊魯書社編輯出版的《藏書家》，⁵就以古代典藏學為主要研究對象。出土文獻的研究，已經日益受到中外學者的重視，成為國際漢學界的顯學。在中國頒佈的「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中，歷史文獻學包括敦煌學和古文字學，是有道理的。事實上，在目前的學科分類體系中，出土文獻學也只有歸入古文獻學，否則很可能將無處可歸，不利於這門國際顯學的進一步發展。筆者認為，出土文獻學應該主要是從文獻學的角度來研究出土文獻，如裘錫圭、駢宇騫、永田英正、鄭如斯、馮勝君、鄧文寬、張湧泉、白化文、張忱石、陳尚君、馬衡、劉屹、胡蘭江等，均有出土文獻學領域的專門論文。同時，此處所說的出土文獻是廣義的，包括一些並不一定是出土而是一直流傳至今的文獻，如金文文獻和石刻（含碑刻、墓誌）文獻。如果說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辨偽學、輯佚學、編纂學和典藏學研究所依據的史料基本上是封閉式的，那麼出土文獻學研究所依據的史料是在不斷增加之中的，從某種意義上更具有生命力，將成為新時期古文獻學研究強有力的增長點和引人注目的亮點，在整個古文獻學科中所占的比重也將繼續增大。出土文獻學的下屬學科包括甲骨文獻學、金文文獻學、簡帛文獻學、石刻（含碑刻、墓誌）文獻學、敦煌吐魯番文獻學等。在這些領域，已有不少論著問世，如張顯成、駢宇騫、段書安、徐自強、趙超、王素、裘錫圭等均有重要成果。《石版文章——歷代碑刻瑣談》其實就是一部關於碑刻文獻學的書。《敦煌學十八講》中的三講的內容，分別為「敦煌佛教、道教文獻的價值」、「敦煌寫本學」和「敦煌寫本的真偽辨別」，直接與敦煌文獻學有關。《新史料檢索與利用》實際上是一部古文獻學著作，該書共計五章，其中四章是關於出土文獻檢索與利用的，分別涉及甲骨文獻、青銅器銘文文獻、簡牘文獻和敦煌文獻，對於出土文獻研究具有較大參考價值。此外，一些古文獻學通論性著作也對出土文

獻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如在《文獻學概要》中，關於出土文獻的部分約占總篇幅的四分之一，共有近10萬字，內容較為全面，包括甲骨文文獻、金文文獻、簡帛文獻、石刻文獻、敦煌文獻以及其他出土文獻（含盟書、璽印、磚瓦文字、紙質出土文獻）。《中國古典文獻學》之第10章為「出土文獻的整理」，包括「出土文獻的類別及整理」、「簡帛文獻」、「敦煌文獻」、「出土文獻與古典文學研究」等四節，共計4萬餘字。《古典文獻及其利用》之第6部分，是關於出土文獻及其利用的，涉及甲骨文獻、金石文獻、簡帛文獻和敦煌文獻。《古文獻學四講》分為四大部分，其中一個部分就是關於碑刻學的。此外，中華書局還出版不定期刊物《出土文獻研究》，廣西教育出版社則出版不定期刊物《簡帛研究》。但美中不足的是，至今尚未有諸如《出土文獻學》之類的通論性專著問世。現已出版的古文獻學通論性著作中，較為全面地涉及古文獻學下屬的三級學科的有：《中國歷史文獻學》（修訂本）涉及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辨偽學、輯佚學、編纂學和藏書史（按：相當於典藏學）等內容；洪湛侯《中國文獻學新編》中的「方法編」，包括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辨偽學、輯佚學和編纂學等6個學科；《古典文獻學》的第3至8章，依次為目錄論、版本論、校勘論、辨偽論、輯佚論和編纂論。至於說有的學者認為避諱學也屬於古文獻學的範疇，也是有其道理的，但是否應成為古文獻學的下屬三級學科，尚需斟酌。同時，中國古代書史、編輯出版史和印刷史以及古籍保護、修復等，雖然不是古文獻學的下屬學科，但與古文獻學（尤其是版本學、編纂學和典藏學）的關係甚為密切，其中的絕大部分研究內容可以歸入古文獻學之範疇。近年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較多，從很大程度上為古文獻學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像《中國印刷史》、《中國科學技術史·造紙與印刷》、《中國金屬活字印刷技術史》、《中國、韓國與歐洲早期印刷術的比較》、《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中國古代書籍紙墨及印刷術》、《中華印刷通史》、《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論》、《中國古籍印刷史》、《中國印刷術的起源》、《中國編輯史（修訂本）》、《中國書史》、《歷代刻

5 《天一閣文叢》第1-4輯（寧波：寧波出版社，2004-2007）；齊魯書社於1999年4月出版第1輯，2006年11月出至第11輯。

書考述》、《中國版印通論》、《福建古代刻書》、《揚州刻書考》、《徽州刻書與藏書》、《中國古代圖書流通史》、《中國圖書發行史》、《中國舊書業百年》、《元代出版史》、《明代出版史稿》、《中國出版史料·古代部分》、《中國印刷史料選輯》、《中國圖書文史論集》、《中文善本古籍保存保護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昌彼得教授八秩晉五壽慶論文集》、《文獻與資訊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顧廷龍文集》、《潘天禎文集》、《冀淑英文集》、《古籍索引概論》、《古籍修復與裝幀》、《中文善本古籍保存保護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以及《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和漢書の印刷とその歴史》、《圖解和漢印刷史》、《中、韓兩國古活字印刷技術之比較研究》等,均為這方面較有影響之專著或論文集,是從事古文獻學研究的重要參考文獻。此外,史料學亦與古文獻學聯繫較多,很多研究內容相互有交叉,如陳高華、陳智超等的《中國古代史史料學》、何忠禮的《中國古代史史料學》、《中國文學史料學》、《中國古典文學史料學》、《中國古典文學史料研究叢書》等,均可供古文獻學研究者參考。應該指出的是,有些名為古文獻學的論著,包含了一些並不屬於古文獻學的內容,例如,《清代文獻學簡論》是一部專題論文集,除了第1章為總論外,其餘7章的標題分別是校勘學、輯佚學、辨偽學、目錄學、分類學、編輯學和翻譯學。筆者認為,將編輯學改稱編纂學較為妥當,因為編纂學與編輯學是有區別的。該書「編輯學」一章收有〈論清儒編書〉和〈安徽清儒編印叢書概說〉兩篇論文,顯然應該屬於編纂學之範疇。而分類學應該包括在目錄學之內。此外,將翻譯學作為古文獻學的下屬學科,也是不合適的。又如,《中國古典文獻學》第10章的標題是「常用工具書學要」,與其他各章的標題目錄、版本、校勘、辨偽、輯佚相並列,同樣是不妥當的。著者的原意可能是想在該書中向讀者介紹一些工具書知識,但畢竟這不屬於古文獻學的內容,如果一定要放,那麼還是作為附錄為宜。再如,張大可、俞樟華的《中國文獻學》是一部很有特色的著作,但該書第7章的標題是「考據學、辨偽學、輯佚學」,將考據學與辨偽學、輯佚學相並列,同時作為古文獻學的下屬學科,似未允當。最後應該說明的是,古文獻學包括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辨偽學、輯佚學、編纂學、典藏學和出土文獻

學等三級學科,並不等於古文獻學的研究內容僅限於上述三級學科,正如同漢語史的研究範圍並不限於其下屬的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詁學等學科。此外,有一些通論性的古文獻學論著,如上文提及的《文獻學概要》等書以及《文獻學論著輯要》、《中國古文獻學史》、《中國文獻學要籍解題》、《中國古代文獻學家研究》、《古今典籍聚散考》、《中國典籍史》、《中國古代典籍十講》、《中國的類書、政書和叢書》、《古籍叢書概說》、《古籍叢書述論》、《近現代新編叢書述論》、「叢書淵源與體制形成之研究」、《類書簡說》、《類書流別(修訂本)》、《類書通論》、《中國類書》、《古代詩文總集選介》等著述,雖不歸屬於哪個三級學科,但同樣是古文獻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此外,筆者認為,古文獻學界應加強斷代文獻學的研究。有關斷代學術史、文化史、文學、史學、哲學方面的專著頗多,但在筆者開始撰寫本文時,尚無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斷代文獻學著作問世。可喜的是,在對本文進行修改時,見到了張富祥的新著《宋代文獻學研究》,該書共計75萬字,詳細論述了宋代文獻學的概況和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辨偽學、輯佚學等的具體情況。原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會長劉乃和生前曾有意主編一套中國古文獻學史,擬斷代為書,分工撰寫,並已作過一些初步的籌劃,後來由於經費困難等原因而中輟,十分遺憾!熱切盼望今後能有更多的此類著述面世。尤其是清代,乃中國古文獻學的集大成時期,人才輩出,著述宏富,很有必要撰寫一部諸如《清代文獻學通論》這樣的著作。同時,除了斷代文獻學通論之外,還應該有斷代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編纂學、辨偽學、輯佚學、典藏學之類的著作。再者,近年來許多省市都注重地方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如「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已經全面啟動,其中包括「浙江歷史文化專題研究」,《浙江文化史》、《浙江文學史》、《浙江史學史》、《浙江藏書史》、《浙江方志史》、《浙江出版印刷史》等業已列入選題,筆者認為還應該加上《浙江文獻學史》。

二、加強對古文獻學理論的總結與研究

在古文獻學研究中,關於古文獻學理論的研究是

最為薄弱的環節，至今未見這方面的專著問世，相關的論文也很少，並且大多數關於古文獻學的論著基本不涉及理論。有不少學者認為，古文獻學無理論。這種觀點並不符合實際。雖然古文獻學與中國古代人文科學中的大多數學科一樣，理論性論著偏少，再加上古文獻學中的版本學、輯佚學和編纂學等，屬於實踐性及技術性較強的學科，理論性論著比其他學科更少。但偏少並不等於沒有，正像以前有人覺得中國古代缺乏語法理論，然而《中國古代語法學探究》卻收錄了大量關於中國古代語法學的理論性論述，雖然大多是片斷甚至隻語，但片斷也是理論，並且這是中國古代人文科學理論性論述的普遍特點。上文提及的《文獻學論著輯要》中，就包括不少古文獻學理論著述。事實上，像班固的《漢書藝文志·總敘》、阮孝緒的《七錄·序》、長孫無忌的《隋書經籍志·總序》、錢大昕的《潛研堂答問》卷10中的〈論經史子集四部之分〉、金錫齡的《劬書室遺集》卷12中的〈七略與四部分合論〉、鄭樵的《通志·校讎略》、胡應麟的《四部正譌》、章學誠的《校讎通義》等，均可視為古文獻學理論性論著。上述論著中，有的理論性還很強，如《校讎通義》，王重民曾指出：「章學誠的《校讎通義》是我國古典目錄學專著中最重要的一部，它對於我國近百年來的目錄學方法、理論一直發生著很大的影響。」⁶該書總結了劉氏父子、班固、鄭樵等歷代文獻學家的理論及方法，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套較為系統的文獻學理論，涉及目錄學、校勘學和版本學等方面，堪稱古文獻學理論領域的典範之作。又如《四部正譌》，最能代表胡應麟在古文獻學理論方面的成就，該書「顯然已使辨偽擺脫了零散的、繁瑣考證的舊窠，向理論化的方向邁出了可喜的一步，奠定了辨偽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雛形」。⁷誠如林慶彰所云：「前代辨偽學家，僅著力於各偽書之辨訂，辨訂之過程雖有理論在內，然並未

將其理論作系統之整理。元瑞（引者按：胡應麟，字元瑞）之《四部正譌》始將辨偽理論系統歸納，其書卷上有偽書情狀二十一條，卷末有辨偽八法，此即元瑞之辨偽理論。」⁸筆者認為，清代以及近現代學者大體上沿襲了胡應麟的辨偽方法，同時就總體而言，後代學者（包括梁啟超）在歸納、論述考辨偽書的方法時，亦未超出胡氏理論之範圍。梁啟超所說的「清儒辨偽工作之可貴者，不在其辨出之成績，而在其能發明辨偽方法而善於運用」，⁹並不符合實際。足見胡氏的辨偽學理論貢獻之大。再如，鄭樵在他的讀書、求書和寫書生涯中，總結、概括出了豐富的整理古文獻的理論和方法，包括求書八法五原則，校勘、訓釋、著錄古文獻的理論與方法等，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古文獻學的理論基礎，¹⁰他的《通志·校讎略》是中國歷史上最早出現的古文獻學理論性著作，該書中所提出的「編次必謹」、「類例分明」等理論具有重要意義，豐富了傳統目錄學的寶庫。另如王念孫在《讀書雜誌·淮南內篇第二十二》中，訂正《淮南子·內篇》的字句訛誤900餘處，並對訛誤之具體成因和表現形式進行了詳細歸納和統計，凡得62例。這62例雖然是就《淮南子·內篇》一書而言，但卻是對古書致誤之由的規律性總結，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普遍性，可以用作校勘其他古書的通例。此乃王念孫對古文獻學理論的重要貢獻。有學者指出，劉向在校書的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經驗，並在不斷深化認識的基礎上建構了古文獻學的基本框架。他對古文獻學屬下的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辨偽學等學科的理論建構，表現出可貴的自覺性。其成就在於承上啓下，把古文獻學的發展由早期形態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¹¹古代關於版本學的理論論述確實很少，但早在明代，葉盛的《水東日記》、屠隆的《考槃餘事》就有關於鑒別宋版書的論述。明代胡應麟的《經籍會通》卷4頗多關於版本的論述，

6 王重民，〈校讎通義通解·序言〉，《校讎通義通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1。

7 曾貽芬、崔文印，〈胡應麟與古籍辨偽〉，《中國歷史文獻學史述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頁473。

8 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修訂版）（臺北：學生書局，1986），頁213。

9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1985），頁385。

10 曾凡英，〈鄭樵文獻學理論探析〉，《自貢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3.2: 4-8。

11 鄧駿捷，〈劉向校書與古文獻學框架的建構〉，《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1: 18-21、57、92。

其中涉及如何評價版本之優劣和價值的問題。清代孫從添的《藏書紀要》內的「鑒別」篇，較為詳盡地論述了鑒別版本之方法。姚伯岳通過艱苦爬梳，在《黃丕烈評傳》一書中，系統總結了黃丕烈的版本學、校勘學、目錄學和典藏學思想，指出：「（黃丕烈）提出了一系列精闢的版本學命題，豐富和完善了版本學的理論體系。」¹²此外，劉歆、鄭玄、陸德明、鄭樵、彭叔夏、朱熹、盧文弨、紀昀、段玉裁、王念孫、顧千里、俞樾等學者在古文獻學理論方面亦頗有建樹。洪湛侯對古文獻學理論研究十分重視，他的《中國文獻學新編》是至今出版的所有古文獻學通論性著作中，唯一將理論作為古文獻學的重要方面加以專門論述的。洪著中的「理論編」包括「中國文獻學理論形成的過程」、「中國文獻學理論的若干特點」、「中國文獻學家的經驗總結和理論建樹」、「文獻學理論整理芻議」等四章，篇幅共計5萬多字，構建起古文獻學理論研究的基本框架，可謂筆路藍縷，功不可沒。該書的增訂本已由臺灣藝文印書館出版，更名為《文獻學》，「理論篇」的內容更加充實。《中國目錄學史論叢》對古代目錄學理論頗為關注，誠如朱天俊在該書的「前言」中所云：「（王重民）十分重視古代目錄學理論著述的研究，善於從書目總序的字裏行間，發掘與闡述古代目錄學家的精闢論斷，給人以啟發。」彭斐章主編的《目錄學教程》在第2章第7節「從古典目錄學到現代目錄學」中，分別論述了「古代目錄學理論的初步探討」、「鄭樵的目錄學思想」、「胡應麟和祁承燦的目錄學思想」、「孫從添的目錄學思想」、「章學誠的目錄學思想」等問題。此外，像《中國目錄學思想史》之類的著作，以及〈從校讎學到文獻學：中國文獻學理論認知的軌跡探討〉之類的論文，也與古文獻學理論研究有關。

三、應加強古文獻學自身的學科理論建設

古文獻學是一門既古老又年輕的學問。筆者認為，雖然中國歷史上第一部以文獻學命名的著作，即鄭鶴聲、鄭鶴春的《中國文獻學概要》撰寫於1928年，1930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但是古文獻學真正作為一門學科，應該說是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逐步建立起來的。《中國文獻學》和《中國古典文獻學》在古文獻學的學科理論建設方面具有開創之功。周國林曾經指出：「張先生學術成就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文獻學理論的研究。」¹³張氏的《中國文獻學》雖然出版於1982年，但是早在1943年，他就撰寫了《廣校讎略》一書，該書可以說是《中國文獻學》之雛形。後來，張氏在《廣校讎略》的基礎上，又撰寫了《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一書，在理論體系上更接近於《中國文獻學》。張舜徽對於古文獻學學科建設的另一重大貢獻，是於1979年主持創建了中國歷史上首個古文獻學專業學術團體，即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並連續擔任三屆會長，後又任名譽會長。1979年春天，來自全國各高校的30多位專家學者因為審稿、定稿而聚首桂林，其間曾醞釀成立學術團體。雖然大家都是從事與文獻學有關的教學與科研，但是對於古文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卻是比較陌生的。張舜徽在會上詳細論述了古文獻學的內涵，並提出成立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¹⁴「在張舜徽先生學術生涯中，貫穿始終的一個研究領域，即是文獻學研究。在近50年間，出版了一系列文獻學著作……這些著作對20世紀後半期中國文獻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在古典文獻學領域，他的著作構建了學科思想、方法與研究規模，並成了古典文獻學研究的基本範式。」¹⁵白壽彝對於古文獻學的學科建設同樣功不可沒。白氏從事學科創建時間早，歷時久，成就突出；構建學科體系理論縝密完善，影響深遠；提出新的學科研究大綱，為學科建設指明了方向。早在1928年，年僅19歲的白氏發表了首篇論文〈整理國故介紹歐化的必要和應取的方向〉，提出整理國故的學者應當做一種有系統的工作。有的學

12 姚伯岳，《黃丕烈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293。

13 周國林，〈張舜徽先生治學的求實精神與博大氣象〉，《華中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1997年《張舜徽先生逝世五周年紀念專輯》，頁14-26。

14 崔曙庭，〈張舜徽先生創建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的重大貢獻〉，《張舜徽先生逝世五周年紀念專輯》，頁27-32。

15 王餘光，〈張舜徽先生的文獻學成就〉，周國林、劉韶軍主編，《歷史文獻學論集》（武漢：崇文書局，2003）。

者認為，該文「是他後來形成的歷史文獻學學科思想的端倪」。¹⁶ 白氏於 1980 年代初發表的〈談歷史文獻學〉和〈再談歷史文獻學〉兩篇論文，對於古文獻學的學科理論建設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後來，白氏在他主編的《中國通史》第 1 卷《導論》第 7 章「歷史理論和歷史文獻學」中，專設「歷史文獻和歷史文獻學」一節，明確提出：「爲了促進歷史文獻研究工作的發展，使其有助於史學工作的發展，現在有必要、也有條件把歷史文獻學做爲一門新的學科建立起來。」¹⁷ 1999 年 4 月，業已九十高齡的白氏，在爲《中國歷史文獻學史述要》一書所作的「題記」中，表達出自己的強烈願望：「建立歷史文獻學這門學科是我的夙願。」¹⁸ 此外，王餘光在《中國歷史文獻學》的「緒論」和《中國文獻史（第 1 卷）》的第 1 編「緒論」中，較爲詳細地論述了與古文獻學的學科理論建設有關的若干問題。鄧廣銘、孫欽善、洪湛侯、顧志華、鄭傑文、趙益、周少川、陳曉華、鄧聲國、馮浩菲、馮淑靜、張子俠、周國林、王餘光、王鑫義、張家璠、周彥文、高柏園、駱偉等的相關論文，對於古文獻學的學科建設也有重要意義。《中國文獻學》第 11 章的標題是「中國文獻學的理論建構」，與該書第 1 章「緒論」前後呼應，互爲補充，力圖從理論層面定位文獻學的歷史地位，並總結 20 世紀文獻學發展所達到的高度。該書在具體論述文獻學理論時，持古今打通之態度，不過以古代爲主。此外，古文獻學下屬的三級學科的學科理論建設同樣值得重視。在這方面，學術界也已取得不少成果。余嘉錫於上個世紀 30 年代所著的《目錄學發微》，是目錄學通論著作中撰寫較早並且極有系統的一部書，對於古籍目錄學的學科理論建設具有重要價值。《目錄學研究》對於古籍目錄學的學科理論建設亦頗有貢獻。來新夏在《古典目錄學》一書的「緒論」中，勾勒出古籍目錄學學科理論的基本框架。《中國目錄學理論》以古籍目錄學的理論爲主要研究對象，希望通過理論的架構，能使古籍目錄學的研究領域突破目錄學史的範疇，並進而使其功能更加擴大。作者認為，古

籍目錄學不應只視爲工具性的學科，而應視爲具有詮釋意義的學科。〈中國古代目錄學的學科自省〉一文，從學科名稱、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和研究目的諸方面，討論了作爲一門科學的中國古代目錄學的一般特徵，頗具見地和特色。王紹曾的〈談談整理、研究古典目錄學遺產的幾個問題和主要任務〉，是撰寫於 1983 年的舊文，已被收入《目錄本校勘學論集》，係首次發表，拜讀後深感對於古籍目錄學的學科建設仍然頗有參考價值。分類學乃目錄學的下屬學科，《中國古代圖書分類學研究》一書，提出了「中國古代圖書分類學」的概念，並首度構建起與之相應的理論體系。《書林清話》採用傳統學術筆記的體裁，第一次爲讀者提供了系統的版本學知識，開後來版本學論著撰述之先，其中很多內容和材料被後來學者沿用，至今仍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堪稱研治古文獻學尤其是版本學的必讀之書，乃版本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傳世名著。《版本通義》是首部以版本爲名的版本學專著，並首次試圖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對版本學進行系統的論述，爲版本學的獨立發展奠定了基礎。《古籍版本鑑定研究》總結、歸納了直觀法（目鑑）和理攻法（考訂）這兩種鑑定古籍版本的重要方法，對於古籍版本學的理論建設貢獻甚大。黃永年長期從事古文獻學研究，並酷愛收藏線裝古籍，曾在圖書館古籍部工作多年，具有豐富的鑑定版本之經驗。《古籍版本學》乃其在該領域數十年研究與實踐心得之理論總結。該書專門列有兩章論述古籍版本學的研究方法，並在其他章節詳細介紹了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以及活字本、抄本、稿本、批校本的鑑別方法，是近年來不可多得之佳作，對古籍版本學的理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曹之在《中國古籍版本學》一書的第 1 章「古籍版本與古籍版本學」中，較爲全面地論述了古籍版本學理論的種種問題，包括古籍版本學的定義、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方法，以及與相關學科的關係和研究古籍版本的意義等。此外，周彥文、石洪運、王國強和周鐵強等學者的有關論文，也值得重視。陳垣在《校勘

16 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編，《歷史科學與理論建設》（北京：北京師範大學，1999），頁600。

17 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1卷《導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頁295。

18 白壽彝，〈中國歷史文獻學史述要·題記〉，曾貽芬、崔文印，《中國歷史文獻學史述要》。

學釋例》卷6「校例」中，提出了著名的「校法四例」，即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已被學術界公認為從事古籍校勘的通例。《校讎學（補訂本）》和《校勘學》從理論上對校勘學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總結。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第5章「史料之搜集與鑑別」中，提出了鑑別偽書的12條公例，這是對古籍辨偽學學科建設的重要貢獻。同時，《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在古籍辨偽學理論領域亦頗有建樹。梁氏堪稱近現代古籍辨偽學研究之開創者。鄭良樹的《古籍辨偽學》一書，在梁氏等人的基礎上，使古籍辨偽學的有關學科理論進一步系統化、規範化，內容也更加充實和豐富。曹書杰的《中國古籍輯佚學論稿》在第1章「緒論」中，對輯佚學的性質、對象、任務、內容以及輯佚學研究的意義均作了具體闡述。《中國書籍編纂史稿》乃編纂學領域較早之著述。《中國古籍編撰史》是一部關於編纂學的力作，較為系統、全面地勾勒出古代編纂學的基本框架。此外，張舜徽對於古代典籍的內容、形式以及編纂著述中的具體事項，都作了多方面的總結。他深入研究了歷代纂輯之作，用力之勤、成果之夥，在當代學者中頗為少見。¹⁹上文提及的程千帆、徐有富的《校讎廣義·典藏編》，較為系統而又全面地勾勒出古代典藏學的基本框架。顧志華在1997年時曾指出：「嚴格地說，到目前為止，文獻學還沒有一個較為完整的得到大家認同的學科體系，仍需要不斷地探索。」²⁰可見古文獻學的學科理論建設，較其他傳統學科更為迫切，任務也更重。

四、加強對近現代（20世紀）古文獻學研究史的總結與研究

阮元曾云：「學術盛衰，當於百年前後論升降焉。」關於近現代（20世紀）有關學科史的研究，已引起學界的關注，一批論著已經問世，如《20世紀的中國語言學》、《20世紀的古漢語研究》、《20世紀的近代漢語研究》、《20世紀簡帛學研究》、《20世紀〈說文〉學流

別考論》、《20世紀墨學研究史》等專著。有的刊物還設立了專欄。但有關20世紀古文獻學的學科研究史，尚未引起充分重視，相關專著尚未寓目，論文亦較少。《20世紀中國歷史文獻研究》、《20世紀中國歷史考證學研究》以及《20世紀古文獻新證研究》中的大部分研究內容，與本文所謂的近現代古文獻學研究史的研究內容並不相同。在人類社會剛剛過去的波瀾壯闊的20世紀中，古文獻學研究者留下了自己堅實的足跡。在此期間，古文獻學研究的發展道路雖經曲折，但仍在許多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很有加以總結的必要。筆者擬全面、系統而深入地考察20世紀古文獻學研究史，最終撰寫成專著《20世紀古文獻學史》。該書所涉及的學科領域包括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辨偽學、輯佚學、編纂學和典藏學等，以時代為經，學者和相關論著為緯。該書的研究內容，以中國內地的古文獻學研究史為主，同時也涉及臺灣、香港地區以及日本等國的中國古文獻學研究史。20世紀的古文獻學研究史，大體上可分為「1901-1949年」、「1950-1978年」和「1979-2000年」三大發展階段。該書採取分階段研究的方法，在每一階段的研究中，先從宏觀上論述該階段古文獻學研究的主要成就及特色，然後再介紹有關學者和論著，並對有代表性的重要學者作個案研究，最後還有該階段古文獻學研究的重要著作書目和重要論文分類索引。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也實事求是地指出20世紀古文獻學研究中的不足之處和薄弱環節。可喜的是，在筆者之前，已有學者在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如周國林、吳楓、謝灼華、石寶軍、朱寧、楊曉駿、王餘光、汪濤、陳幼華、劉兆祐、丁原基、黃鎮偉、曹書杰、王鏊、代根興、薛旻、王娟、王艷、曹之、司馬朝軍、李明傑、石洪運、桂勝、朱太岩、周鐵強、管錫華、劉重來等，均發表過富有價值之文。此外，〈20世紀中國書史研究回顧〉中的許多內容，也與古文獻學研究史密切相關。張大可、俞樟華的《中國文獻學》，是目前已經出版的古文獻學通論性著作中，最注重反映20世紀古文獻學研究史的。該書在有關章

19 參見周國林，〈張舜徽先生之纂輯觀及其實踐〉，周彥文主編，《文獻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第二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23-241；韋順利，〈試論張舜徽先生的古籍編纂理論〉，《張舜徽先生逝世五周年紀念專輯》，頁59-61。

20 顧志華，〈卓有建樹，自成一家——張舜徽教授文獻學成就評述〉，《張舜徽先生逝世五周年紀念專輯》，頁44-49。

節中，用較多的篇幅分別介紹了「20世紀的目錄學家及其成就」、「20世紀的版本學」、「20世紀的校勘學成就」、「20世紀辨偽學的發展與理論建構」等內容。同時，楊燕起、高國抗主編的《中國歷史文獻學》，在第10章中專門論述了古文獻學的現狀與前景，約有3萬字；洪湛侯的《中國文獻學新編》，也有一章的內容是關於近當代古文獻學研究史的，共有1萬多字；《中國文獻學史要略》之第5章為「當代文獻學的形成（本世紀以來）」，包括「文獻研究的新成就」、「文獻史研究」、「文獻整理的理論與方法」、「文獻學理論的探討」等四節，也有1萬多字。曹之的《中國古籍版本學》之第3章為「古籍版本學史略」，其中的第5部分是「當代古籍版本學」。《中國圖書版本學》之第2章為「版本學史」，其中的第4節論述了20世紀版本學研究的歷史。《漢書·藝文志》研究源流考》共計41萬字，詳細論述了從古至今的《漢志》研究史，其中約半數內容屬於20世紀古文獻學研究史的範疇。此外，周彥文、趙飛鵬、胡楚生等學者的有關綜述性文章，論及臺灣地區的古文獻學研究史，從很大程度上填補了空白。

參考書目

- 丁原基，〈近十年文獻學專著之述評〉，「中山文化暨古典文獻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東吳大學圖書館等，2007.4）。
- 上海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印刷印鈔分會編，《中國印刷史料選輯》（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90-1993），該選輯包括《雕版印刷源流》、《活字印刷源流》、《歷代刻書概況》、《裝訂源流和補遺》等4種論文集。
- 中國國家圖書館編，《中文善本古籍保存保護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北京圖書館，2002）。
- 中華書局編，《中國古典文學史料研究叢書》（北京：中華書局，正陸續出版中）。
- 王子今，《20世紀中國歷史文獻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
- 王玉德，《輯佚學稿》，李國祥主編，《古籍整理研究（八種）》（武漢：武漢工業大學出版社，1989）。
- 王叔岷，《校讎學》（補訂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5）。
- 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84）。
- 王素，《敦煌吐魯番文獻》（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 王國強，〈關於中國古籍版本學基本理論研究現狀〉，《河南圖書館學刊》1993.1: 36-39。
- 王紹曾，〈談談整理、研究古典目錄學遺產的幾個問題和主要任務〉，《目錄版本校勘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207-235。
- 王澄，《揚州刻書考》（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 王餘光，〈中國歷史文獻學研究述論〉，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日）築波大學圖書館情報學系編，《中日圖書情報學研究進展》（北京：北京圖書館，2005），頁47-56。
- 王餘光，〈文獻學研究的新進展〉，《江西圖書館學刊》35.2（2005.6）: 1-2。
- 王餘光，《中國文獻史》（第1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
- 王餘光，《中國文獻學史要略》，李國祥、楊昶主編，《國學知識指要——古籍整理研究》（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
- 王餘光，《中國歷史文獻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
- 王餘光、汪濤、陳幼華，〈中國文獻學理論研究百年概述〉，《圖書與情報》1999.3: 12-19。
- 王鐸，〈20世紀中國古籍目錄學研究與實踐綜述〉，《圖書與情報》2001.4: 2-9、16。
- 王鑫義，〈文獻學學科體系畧議〉，「徵學與明清安徽典籍研究暨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第25屆年會」論文（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等，2004.9）。
- 王鑫義，〈《我國文獻學的分級分類表解》評議〉，《學術界》2005.3: 115-121。
- 王艷，〈1998年以來目錄學史研究綜述〉，《圖書與情報》2004.6: 39-41、49。
- 代根興等，〈中國目錄學研究十五年〉，《山東圖書館季刊》1995.3: 1-5。
- 卡特著，吳澤炎譯，《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北京：商務印書館，1957）。
- 永田英正，〈漢簡的古文書學研究〉，《簡帛研究》第3輯（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頁279-294。
- 田建平，《元代出版史》（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 白化文，〈中國敦煌學目錄和目錄工作的創立與發展簡述〉，《敦煌吐魯番研究》第7卷（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156-173。
- 白壽彝，〈談歷史文獻學〉，《史學史研究》1981.2: 1-8。
- 白壽彝，〈再談歷史文獻學〉，《中國史學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523。
- 白壽彝，〈整理國故介紹歐化的必要和應取的方向〉，上海《民國日報》1928.4.23「覺悟」版。
- 石洪運，〈版本學基礎理論研究述評〉，《黑龍江圖書館》（《圖書館建設》）1991.3: 57-60。
- 石洪運、桂勝，〈建國以來版本學研究綜述〉，中國圖書館學會學術委員會古籍版本研究組編，《版本學研究論文選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頁389-399。
- 任繼愈主編，《中國藏書樓》（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
- 朱太岩，〈建國四十年來版本學成果述要〉，《古籍整理研究學

- 刊》1989.5: 36-41。
- 牟玉亭,《中國古典文獻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
- 何忠禮,《中國古代史史料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北京:中華書局,1963)。
- 余慶蓉、王晉卿,《中國目錄學思想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 吳雪美編輯,《文獻與資訊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2001)。
- 吳楓,《中國古典文獻學》(濟南:齊魯書社,1982)。
- 吳楓,〈歷史文獻學四十年之我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9.5: 13-18。
- 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古代部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 李明杰,〈20世紀中國古籍版本學史研究綜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3.2: 55-60。
- 李春光,《古籍叢書述論》(瀋陽:遼寧書社,1991)。
- 李致忠,《中國版印通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
- 李致忠,《歷代刻書考述》(成都:巴蜀書社,1990)。
- 李致忠、周少川、張木早,《中國典籍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 李清志,《古籍版本鑒定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
- 李瑞良,《中國古代圖書流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杜澤遜,《文獻學概要》(北京:中華書局,2001)。
- 汪辟疆,《目錄學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 肖東發,《中國圖書出版印刷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 來新夏,《古典目錄學》(北京:中華書局,1991)。
- 來新夏等,《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周少川、陳曉華,〈中國歷史文獻學學科建設的思考〉,周國林主編,《歷史文獻研究》總第22輯(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頁1-8。
- 周彥文,〈五十年來目錄學的發展與著作〉,邱炯友、周彥文主編,《五十年來的圖書文獻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4),頁277-294。
- 周彥文,〈文獻認知上的新經驗〉,《古代文獻的考證與詮釋——海峽兩岸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48-63。
- 周彥文,〈文獻學概念下的版本論述〉,淡江大學中文系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主編,《昌彼得教授八秩晉五壽慶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5),頁199-210。
- 周彥文,〈由兩岸文獻學的現況論文獻學的定位問題〉,《書目季刊》38.1(2004.6): 1-17。
- 周彥文,《中國目錄學理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
- 周國林,〈20世紀中國古文獻學片論〉,「中國古典文獻學及中國學術的總體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紀年顧廷龍先生誕辰101周年」論文(上海:復旦大學古籍研究所等,2005.11)。
- 周國林,〈歷史文獻學理論研究中的歷史感問題〉,《古代文獻的考證與詮釋——海峽兩岸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頁18-29。
- 周鐵強,〈近年來古籍版本學理論研究述評〉,《上海高校圖書情報學刊》1995.1: 53-56。
- 林慶彰主編,鄭誼慧編輯,《近現代新編叢書述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5)。
- 長澤規矩也,《和漢書の印刷とその歴史》(東京:吉川弘文館,1952)。
- 長澤規矩也,《圖解和漢印刷史》(東京:汲古書院,1976)。
- 姚伯岳,《中國圖書版本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 姚福中,《中國編輯史(修訂本)》(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 洪湛侯,〈古典文獻學的重要課題——兼論建立文獻學的完整體系〉,《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1987.2: 86-95。
- 洪湛侯,《中國文獻學要籍解題》(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7)。
- 洪湛侯,《文獻學》(再版)(臺北:藝文印書館,2004)。
- 胡楚生,〈三十年來臺灣學術界對於版本目錄學之研究概況〉,《中國書目季刊》30.4(1997.3)。
- 胡道靜,《中國古代典籍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 胡蘭江,〈郭店楚墓竹簡研究綜述〉,《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3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271-293。
- 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
- 夏南強,《類書通論》(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
- 孫良明,《中國古代語法學探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 孫欽善,〈古文獻學及其意義與展望〉,《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2: 108-112。
- 孫欽善,〈古籍整理與古文獻學〉,曹亦冰主編,《兩岸古籍整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頁601-612。
- 孫欽善,〈關於中國古代文獻與古文獻學史〉,《社科縱橫》1994.1: 31-32、5。
- 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4)。
- 徐有富主編,《中國古典文學史料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
- 徐自強,《古代石刻通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 徐雁,《中國舊書業百年》(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 馬衡,〈漢石經概述〉,《考古學報》1955.10: 1-11。
- 高俊寬,〈從校讎學到文獻學:中國文獻學理論認知的軌跡探討〉,《圖書情報工作》2002.10: 116-120。
- 高柏園,〈中國文獻學方法的實用性與哲學性〉,《文獻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第二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2)，頁327-337。
- 張三夕主編，《中國古典文獻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 張大可、俞樟華，《中國文獻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 張子俠，〈關於中國歷史文獻學基本理論的幾點認識〉，《安徽大學學報》(哲社版)2005.4:108-114。
- 張志強、潘文年，〈20世紀中國書史研究回顧〉，《漢學研究通訊》22.4(2003.11):35-47。
- 張忱石，〈《隋唐五代墓志彙編》舉正〉，《出土文獻研究》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274-298。
-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 張秀民著，韓琦增訂，《中國印刷史》(插圖珍藏修訂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 張家瑤，〈關於中國歷史文獻學碩士生培養工作若干問題的思考〉，「徽學與明清安徽典籍研究暨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第25屆年會」論文。
- 張家瑤、閻崇東，《中國古代文獻學家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 張富祥，《宋代文獻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張湧泉，〈敦煌文獻校讀釋例〉，《文史》第41輯(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189-204。
- 張舜徽，《中國文獻學》(鄭州：中州書畫社，1982)。
- 張舜徽，《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北京：中華書局，1962)。
- 張舜徽選編，《文獻學論著輯要》(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
- 張滌華，《古代詩文總集選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張滌華，《類書流別(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
- 張樹棟等，《中華印刷通史》(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99)。
- 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04)。
- 戚志芬，《中國的類書、政書和叢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 曹之，〈近五十年版本學研究的回顧和展望〉，「21世紀文獻學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論文(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04.11)。
- 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
- 曹之，《中國古籍編撰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
- 曹之，《中國印刷術的起源》(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
- 曹之、司馬朝軍，〈20世紀版本學研究綜述〉，《圖書與情報》1999.3:1-11。
- 曹炯鎮，《中、韓兩國古活字印刷技術之比較研究》(臺北：學海出版社，1986)。
- 曹書杰，〈中國古典目錄學研究概述(1950-1988)〉，《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9.5:30-35、12。
- 曹書杰，〈中國輯佚學研究百年〉，《東南學術》2001.5:98-107(《新華文摘》2002.1全文轉載)。
- 曹書杰，《中國古籍輯佚學論稿》(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 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梁啟超國學講錄二種》(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 陳其泰主編，《20世紀中國歷史考證學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 陳尚君，〈石刻所見唐人著述輯考〉，《出土文獻研究》第4輯(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126-138。
- 陳垣，《校勘學釋例》(北京：中華書局，1959)。
- 陳高華、陳智超等，《中國古代史史料學》(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 陳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 陳廣忠等，《古典文獻學》(合肥：黃山書社，2006)。
- 傅榮賢，〈中國古代目錄學的學科自省〉，《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2.2:65-68。
- 傅榮賢，《《漢書·藝文志》研究源流考》(合肥：黃山書社，2007)。
- 傅榮賢，《中國古代圖書分類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
- 傅璇琮、謝灼華主編，《中國藏書通史》(寧波：寧波出版社，2001)。
- 彭斐章主編，《目錄學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 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典藏編》(濟南：齊魯書社，1998)。
- 馮浩菲，〈我國文獻學的現狀及歷史文獻學的定位〉，《學術界》2000.4:115-122。
- 馮浩菲，〈試論中國文獻學學科體系的改革〉，《文史哲》2002.1:107-111。
- 馮淑靜，〈中國文獻學學科體系建設的成就與發展構想〉，《理論學刊》2004.11:114-117。
- 馮勝君，〈從出土文獻談先秦兩漢古書的體例(文本書寫篇)〉，《文史》2004.4:25-35。
- 馮勝君，《20世紀古文獻新證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6)。
- 黃永年，《古文獻學四講》(廈門：鷺江出版社，2003)。
- 黃永年，《古籍版本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 黃曉斧編著，彭靜中校訂，《新史料檢索與利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88)。
- 黃鎮偉，〈近八十年來目錄學、校勘學、版本學研究書目解題〉，《中國書目季刊》28.3(1994.12):42-55、28.4(1995.3):43-57。
- 楊昶，《辨偽學講義》，李國祥、楊昶主編，《國學知識指要——古籍整理研究》(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
- 楊琳，《古典文獻及其利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 楊緒敏，《中國辨偽學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 楊曉駿，〈我國文獻學發展軌跡初探〉，《圖書與情報》1995.2:11-15。
- 楊燕起、高國抗主編，《中國歷史文獻學》(修訂本)(北京：

- 北京圖書館，2003)。
- 葉德輝，《書林清話》(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
- 葉樹聲、許有才，《清代文獻學簡論》(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
- 裘錫圭，〈中國出土簡帛古籍在文獻學上的重要意義〉，《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集刊》(一)(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頁1-12。
- 裘錫圭，〈出土古文獻與其他出土文字資料在古籍校讀方面的重要作用〉，《古籍整理與研究》第4期(北京：中華書局，1988)。
- 裘錫圭，《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 路遠、裴建平，《石版文章——歷代碑刻瑣談》(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 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 管錫華，〈七十年代末以來大陸校勘學研究綜述〉，《漢學研究通訊》21.3(2002.8)：1-11。
- 管錫華，《校勘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
- 趙含坤，《中國類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 趙飛鵬，〈五十年來版本學的研究與著作〉，《五十年來的圖書文獻學研究》，頁247-276。
- 趙益，〈古典文獻學原理芻議〉，李浩、賈三強主編，《古代文獻的考證與詮釋——海峽兩岸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頁30-47。
- 趙超，《古代墓志通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 劉兆祐，〈百年來圖書文獻整理之回顧與展望〉，「中山文化暨古典文獻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東吳大學圖書館等，2007.4)。
- 劉屹，〈論20世紀的敦煌道教文獻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第7卷，頁199-222。
- 劉尚恒，《古籍叢書概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劉尚恒，《徽州刻書與藏書》(揚州：廣陵書社，2003)。
- 劉重來，〈中國20世紀文獻辨偽學述略〉，《歷史研究》1999.6：133-143。
- 劉葉秋，《類書簡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劉寧慧，「叢書淵源與體制形成之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6)。
- 潘天禎，《潘天禎文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2)。
- 潘吉星，《中國、韓國與歐洲早期印刷術的比較》(北京：科學出版社，1997)。
- 潘吉星，《中國金屬活字印刷技術史》(瀋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
- 潘吉星，《中國科學技術史·造紙與印刷》(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
- 潘美娣，《古籍修復與裝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 潘樹廣，《古籍索引概論》(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4)。
- 潘樹廣主編，《中國文學史料學》(合肥：黃山書社，1992)。
- 潘樹廣等，《文獻學綱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 鄭士德，《中國圖書發行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 鄭如斯，〈從近年新出土文獻看我國古代書籍制度〉，鄭如斯、肖東發編，《中國書史教學參考文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頁257-266。
- 鄭如斯、肖東發，《中國書史》(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
- 鄭良樹，《古籍辨偽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
- 鄭傑文，〈關於中國古文獻學科建設的幾點思考〉，周彥文主編，《文獻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第二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697-714。
- 鄧文寬，〈敦煌本《六祖壇經》書寫形式和符號發微〉，《出土文獻研究》第3輯(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228-233。
- 鄧廣銘，〈談古文獻學科建設及人才培養〉，《古籍整理與研究》第2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鄧聲國，〈關於中國古典文獻學學科內容設置問題之我見：20世紀世紀諸家古典文獻學著述比較研究之一〉，《書目季刊》37.4(2004.3)：1-16。
- 冀淑英，《冀淑英文集》(北京：北京圖書館，2004)。
- 錢存訓，《中國古代書籍紙墨及印刷術》(北京：北京圖書館，2002)。
- 錢存訓先生八十生日記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圖書文史論集》(北京：現代出版社，1992)。
- 錢存訓著，鄭如斯編訂，《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 錢基博，《版本通義》(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 駱宇騫，〈出土簡帛書籍題記述略〉，《文史》2003.4：26-56。
- 駱宇騫、段書安，《本世紀以來出土簡帛概述(資料篇、論著目錄篇)》(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
- 駱偉，〈中國文獻學之發展趨向〉，「中山文化暨古典文獻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東吳大學圖書館等，2007.4)。
- 繆咏禾，《明代出版史稿》(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 薛旻、王娟，〈1998年以來目錄學史研究綜述〉，《圖書館》2004.3：26-29。
- 謝水順、李珽，《福建古代刻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 謝灼華、石寶軍，〈中國文獻學研究發展述略〉，《中國圖書館學報》19.2(1993.4)：38-46。
- 謝灼華、朱寧，〈20年來我國文獻學理論研究綜述(1978-1998)〉，《晉學刊》1999.3：1-7。
- 韓仲民，《中國書籍編纂史稿》(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88)。
- 魏隱儒，《中國古籍印刷史》(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84)。
- 顧廷龍，《顧廷龍文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2)。
- 顧志華，〈關於文獻學研究的幾個問題〉，周國林、劉詔軍主編，《歷史文獻學論集》(武漢：崇文書局，2003)，頁17-26。
- 顧志興，《浙江藏書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06)。